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

〔四川部分〕

附件

中共涪陵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附件一

《红三军入川的历史背景及情况》参考资料

目 录

《红三军入川的历史背景及情况》参考资料.....	(1)
《湘鄂西工农红军和根据地武装大事记》(一九三三年)	(6)

附件一

《红三军入川的历史背景及情况》参考材料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后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到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摘自《八一杂志》1959年20期刘伯承《回顾长征》）

湘鄂西的土地革命斗争，始发于一九二七年的秋收起义。但这个起义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南昌起义受到挫折以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武装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形势鼓舞下，来到湘鄂西，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由于实行了许多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加上红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已取得很大胜利。

一九三〇年七月，贺龙同志领导的湘鄂边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周逸群同志领导的鄂西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

……

一九三一年三月，红二军团又接到湘鄂西特委（不久即改为湘鄂西省委）的决议，要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

（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250—254页 许光达 王震 王尚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关键在于路线正确与否，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秋天，湘鄂西遭到两次大的挫折，革命力量损失很大，这两次失败是在第二、第三次左倾路线直接影响下造成的。一九三〇年七月邓中夏同志来到湘鄂西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并带走当地绝大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杨林一战失利，红二军团不得不进入湘鄂边。

……

更严重的挫败发生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秋天，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同志，执行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许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

昌、沙市、岳州、武汉，不许打小据点。后来还取消了军队内的政治机关；在根据地建设上，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扩大了打击面，脱离了群众；在党内军内，把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优秀干部，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把湘鄂西整个苏区搞完了。一九三三年，红军被迫退出洪湖，经豫南、陕南、川东转移至鹤峰时，由二万五千余人锐减到一千多人，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红军中的干部和地方党曾经进行过反复的斗争，但由于左倾路线占着统治地位，这些斗争同红军取得的多次胜利，都未能挽救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面。

（摘自《星火燎原》下集 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

关于夏曦，是执行二次左倾路线的，肃反扩大化。……红三军的干部在五次肃反中杀了五、六批，贺老总反对，他坚决不干，一直到二、六军团会师以后，没有可肃的可杀的了，再加上贺龙同志的斗争才停止了。当时关向应同志维护贺龙同志的领导，否则，贺龙同志也不敢同他斗的。当时部队全靠贺龙同志的威望才坚持下来，因为在夏曦领导时政治工作等都取消了。

（摘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以下简称《红二方面军长征情况》—1975年7月16日转抄自重庆博物馆《文物资料》分类第16号）

红三军的肃反和夏曦同志的错误

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违犯纪律，杀鸡宰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已（红八师参谋长，四川人，大革命时期党员），这时后方的“肃反”已经大规模开展了。“肃反”是后方先开始的。不久，军部回到洪湖，卢冬生的特务队就被调到周老嘴专门看守“改组派”犯人去了。

夏曦在文泉墩战斗后，就下令捉了孙德清。孙是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还捉有七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同志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

文泉墩战斗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

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从1932年2月第一次“肃反”开始，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下来，湘鄂西地区先后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肃反”）；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了下来。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里刻过油印。

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但夏曦还不断杀人。对段德昌、王炳南皆不相信，开会不找他们、并且两次企图对我下手。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近代史研究》1981、1、23—25页）

自湘鄂西党的四次代表大会到红三军转战湘鄂边，贺龙等同志与执行错误路线的夏曦同志除了在作战原则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外，还在肃反、对敌斗争策略和要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三个主要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关于肃反问题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一年底到一九三二年初，曾给湘鄂西党组织发来多次指示，这些指示把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认为湘鄂西苏区内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夏曦同志不遗余力地贯彻了这些指示。认为：革命势力愈大，反革命愈团结，阶级斗争愈激烈，阶级敌人必然更加利用一切方法在各种组织中加紧反革命活动。根据这种理论，他们不但把肃反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还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是非问题，一般地违反纪律的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反对过他们的错误路线的人，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夸大了暗藏敌人的力量，陷入了主观唯心论的泥坑。他们甚至把对敌斗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个人主义的打击报复纠缠在一起，轻率地给许多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国民党”等帽子，当做“反革命”处理。在他们控制下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只要他和某几个肃反人员的决定，就可以轻易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他们一开始就采取逼、供、信、和步步株连的作法，使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他们搞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

第一次是在洪湖期间，把许多地方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捕一批，又捕一批，一直捕到根据地失陷。由于一大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从而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力量，这是洪湖根据地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三次大规模肃反是在红三军艰苦转战豫西南、陕南和湘鄂边期间。

第四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以后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夏。

贺龙同志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多次提出必须停止错误的肃反。夏曦同志……继续一意孤行，对贺龙同志也是屡加排斥和诬陷，只是慑于贺龙同志在红军及人民中的威望才未敢动手。贺龙同志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并亲自放掉了一些无辜被捕的同志。例如刘林同志（江苏省军区副司令）是被捉去出枪毙时，被贺龙同志看见了，极力阻止，才放了的。还有王尚荣、黄新庭、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同志都是已被他们捆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同志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的。……

夏曦同志为了进一步贯彻其错误的肃反政策，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在毛坝召开的中央分局扩大会上提出：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都是“改组派”，因此必须解散党的组织。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坚决反对。贺龙说：“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

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宋盘铭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对此，夏曦同志不但不接受，反而怀恨在心。三月，部队到达金果坪时，他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并取消了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与此同时，他还毫无根据的以“分裂红军”的罪名，背着贺龙同志将段德昌（按：在金果坪）、宋盘铭（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在黔江城西北门）同志杀害了。

夏曦同志推行的错误的肃反政策，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先后遭到杀害，给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并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心理，扼杀了党的民主，窒息了各级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长征前的贺龙同志》中《艰苦转战七千里》
湖南人民版1978、11、第62—65页）

到麻水，段德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夏就说段德昌要带九师跑。当时九师在沙道沟，我说他不会跑，要跑还写信来。结果还是把他从鄂阳关调回来，夏曦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要“严厉打击。”头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在金果坪把他杀了。以后，把王炳南、宋盘铭都捆了。在麻水我同王炳南谈过一次话，隔几米就闻到臭味，他身上伤得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说王炳南没问题，应该放。夏非杀他不可，他把人整成这样子，怕结仇，非杀不可。宋盘铭是在七、九两师分开时趁夏不在，我说看看他身上是不是还有好的地方，看看还好，就把他放了。以后夏曦不答应，在打黔江途中，还是把他抓来杀了。宋盘铭是个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

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有责任。我没有参加肃反委员会，他们逮捕那么多干部，都不同我商量，逮捕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我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原注：1933年3月24日，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决定解散红三军的和地方的各级党团组织，撤销红三军各级政治机关。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

一九三一年三月，（王明控制的临时中央）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并负责组成中央分局，从而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反对立三路线和“右倾逃跑”的旗帜下，否定一切，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排除于领导集团之外。

.....

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三军根据中央命令，从鄂西北回到鄂西区。左倾分子为了控制红三军和排挤贺龙同志对红三军的领导，污蔑红三军一贯右倾，取消了红三军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

（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敌人的频繁进攻下，左倾分子主持的中央分局不得不又恢复了红三军军部并重新编成了七、八、九三个师。

.....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不顾外患的日益严重，调集五十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蒋介石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赣和湘鄂西根据地进攻，这次进攻湘鄂西的兵力约有十万以上。他们占领了襄北以后，又向襄南进攻。八月，左倾分子不顾当时敌人围攻的形势和红军中广大干部的反对，又命令红三军向荆州、沙市进攻。攻坚又不成，形势更加对我们不利，敌人的包围已日益缩小。鉴于无法在内线破敌，许多领导干部主张集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迂回到敌后，从外线打破敌人的围攻，来挽救鄂西根据地。但分局书记夏曦同志却又指令红三军平分兵力，以五个团向襄北出击，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苏区内部分兵把口。这种“两个拳头”的办法，加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一点希望。红三军军部率五个团刚过汉水，敌人凭其绝对优势的兵力，由仙桃、沔阳、潜江一线冲进苏区腹地。我留在内线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的机关和后勤部门遭到了重大损失，不得不分批仓卒突围。由此反围攻失败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红三军主力会合于襄北小洪山一带，后来决定开往湘鄂边。英勇的红三军，一路上克服了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疾病、疲乏等严重困难，跋山涉水，斩关夺隘，粉碎了敌人前堵后追，消灭了许多敌人，经豫南，陕南进入湘鄂边。……一九三三年初，红三军进入湘鄂边，再占鹤峰、桑植两地。这时分局书记夏曦同志并没从严重的挫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一面消极悲观，一面仍然坚持发展错误，如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则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

……

一九三三年夏季，敌人又纠集了重兵向鹤峰进攻。红军就机动地向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这期间，对革命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光荣的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紧紧地团结在贺龙同志周围，为争取新的胜利而坚持斗争，并一度占领利川、黔江、彭水、沿河等城。

（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256—259页及许光达 王震 王尚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贺龙谈根据地的路线政策问题

我们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逐步转变的。（遵义会议以后）接受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是还存在着三次“左”倾路线的残余。对毛主席的思想，我们是逐步认识的，并不是遵义会议决议一来，就马上接受了，这其中有个过程。我感到我们对军事路线比对政治路线认识的好，军事路线转变的快一点。因为当时军事压力大，逼着我们去改，政治路线的转变慢一些。

任弼时同志（在湘赣苏区）执行“左”倾路线，一到湘鄂川黔就转变了？不能这样说，那么他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接受？也不能这样说。他接受了，但改的是很慢的。解决夏曦同志的问题，他的批评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不对的，如他批评夏曦时提到“北方落后论”和“罗明路线”。对贺炳炎的看法也有问题，说他自首（指在红三军“肃反”扩大化时自首），不能重用，很长时间怀疑他。我对他说，贺炳炎大字不识，连共产党都搞不清楚，又

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夏曦把干部杀完了还在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是大会决定小会决定的，我是不知道的，关向应也不知道。夏去六军团在前，中央电报在后。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

我们这些人不是猫子，猫子拉了屎能埋起来，你还能埋起来的呀？“左”了嘛，很多不该杀的杀了嘛。湘鄂川黔就那么好吗，一点问题都没有？群众起来没有？

收集历史资料，收集什么？湘鄂川黔要不要红线？红线是那个？反面的多正面的少嘛。湘赣执行的是不是“左”倾路线？如果把毛主席的指示多研究一下，我们都拉出去了（指到根据地外部作战）。“左”的东西印象深。

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对湘鄂川黔这一段，可以不当一个路线问题提，但是要把正确的和错误的写清楚，而且要说明是逐步转变的，这样才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摘自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1、33—34页）

红三军入黔的原因

原来打算先把彭水打下来，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回头再来占领酉阳。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是四川湖南交界的地方；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资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山大，有利条件多。打下彭水后，我们非常高兴，准备回头再打酉阳。但夏曦一个人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入贵州。

大村会议还是谈肃反问题，也谈了发展方向（建立酉秀黔彭根据地）问题。

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向应）商量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如何争取神兵的问题。在枫香溪会议上提出来以后，夏……但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

（摘自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1、29页）

湘鄂西工农红军和根据地武装大事记

（一九三三年）

一月

十三日，红军攻占桑植县城。二十六日红三军奉命向新三十四师周燮卿旅进攻，经激战未能获胜。二十八日反被迫退出桑植。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红三军开始清党（重新审查登记党员）。

二十一日，卢冬生同志率领之独立师攻占兴山城，得悉红三军抵湘鄂边向桑鹤地转移。二月在鹤峰走马坪与红三军会合。

二月

中央分局在走马坪召开会议，决定发展鹤峰苏区，将红三军缩编为七、九两师，独立师编为红三军教导团。

三月

第三次错误的肃反开始。段德昌等许多同志被诬害。

二十四日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会议，决定解散红三军和地方的各级党团组织，撤销红三军各级政治机关。

五月

第四次错误的肃反开始，宋盘铭等许多同志被害。

七月

教导团解散，编入红七师。

敌向龙（山）鹤峰地区发动围攻，先后侵陷麻火、向关全、金果坪、官店口。红军军部率九师转移到宣恩、利川、咸丰一带活动。

八月

红七师在五里坪歼敌一个营，继又袭占五峰县城。二十五日又袭歼松滋、磨盘川之敌，二十七日进攻西斋失利，部队撤返鹤峰游击。

十二月

七、九两师在鹤峰之石灰窑会合。中央分局在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

（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史》（初稿）——以下简称《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保管部）

附件二

《红三军挥师入川》查证材料

目 录

第一部分	红三军入川时敌我双方情况.....	(10)
第二部分	《首战攻克黔江》查证、参考资料.....	(12)
	关于当时黔江守敌之兵力部署.....	(12)
	关于红军攻打黔江的时间及战斗经过.....	(12)
	红军在黔江县城的活动.....	(14)
	关于红军执行纪律情况及军民关系.....	(15)
	关于红军在黔江“扩红”及鄂川边游击队的成立情况.....	(17)
	关于鄂川边独立团的成立及初期活动.....	(17)
第三部分	《迂回通过石柱》查证资料.....	(19)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石家坝、黄水坝等地.....	(19)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到二十日在石柱城郊学习休整.....	(19)
第四部分	《转战西、黔边境》查证、参考资料.....	(22)
	《湘鄂西工农红军及根据地武装斗争大事记要》(摘抄).....	(22)
	红七师在西黔边境的活动.....	(22)
	四月四日在细沙河.....	(23)
	四月七日在沙子场.....	(26)
	沿途的政治宣传、军民关系及“扩红”情况.....	(27)
	红军在西、黔边境.....	(28)
	四月二十日到沙子场.....	(28)
	四月二十一日到马喇湖.....	(28)
	四月二十三日在毛坝.....	(28)
	四月二十四日在腴地.....	(29)
	四月二十六日在柏家溪.....	(30)

四月二十七日在财神沟·····	(31)
四月三十日在八穴·····	(32)
五月四日在大坝·····	(33)
五月五、六日在马喇湖、濯河坝、水车坪一带·····	(35)
打土豪情况·····	(35)
执行纪律情况·····	(36)
沿途写的革命标语·····	(37)
“扩红”情况·····	(37)
第五部分 《奔袭彭水县城》查证材料·····	(38)
五月七日在桑柘坪·····	(38)
五月八日攻打彭水县城·····	(41)
攻城时间·····	(41)
我军先遣人员在彭水的活动·····	(41)
敌方情况·····	(42)
攻城情况·····	(42)
红军在彭水县城的活动·····	(43)
打击反动势力 解放人民群众·····	(45)
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47)
渡过乌江以后·····	(47)
五月十日在下岩西·····	(47)
五月十一、十二日在上岩西·····	(48)
五月十三日在朗溪·····	(49)
宣传工作与群众纪律·····	(50)
《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	(52)
各地群众支持、赞扬红军·····	(54)
旧资料上关于红军袭彭的记载·····	(54)

附件二

《红三军挥师入川》查证材料

第一部分

红三军入川时敌我双方情况

1933年8月，红三军进入湖北咸丰县之活龙坪、黑洞、大村、小村一带活动。

（摘自咸丰县档案馆《党史资料》 王图碧抄）

（1933年12月）红七、八两师在鹤峰之石灰窑会合，中央分局在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

（摘自《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

红三军因为得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进行休整补充，领导上便决定在鄂川边去打开一个局面，相机建立根据地，七师的一个团在红三军先头去攻打四川的黔江县。

（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294页 王绍南：《黔东的春天》）

酉阳政协委员陈子尚（曾任国民党“清共委员会”代理事务主任）反映：一九三三年贺龙将军率红二军团在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四省边区封建势力大为震动，纷纷向上呼吁。地方军阀刘湘、王家烈、何健、何成濬等也迭电伪中央告急。独夫民贼蒋介石从江西南昌行营回电，命令伪廿一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为四省边区“会剿”司令，组织四省反动武装，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

一九三三年春，刘湘秉承蒋贼旨意，在重庆召开了“四省边区会议”。贵州军阀王家烈、湖南军阀何健、湖北军阀何成濬均派代表参加。四川方面，伪廿一军参谋长郭昌民、伪重庆警备区司令李根固等人出席了会议，川东各县的“清共委员会”事务主任十余人，也奉命列席会议以备咨询。会议开了好几天，根据蒋介石的反革命经验，制定了办民团、筑碉堡、设保甲，建立联络哨等一系列反革命措施，由四省分别通知边区各县遵照执行。

当时伪廿一军第五师达奉纲旅，驻防于涪、彭两县，伪廿一军直属田冠五旅驻酉、秀，刘湘的边区剿匪司令周化成，则率部驻防于黔江。

刘湘在急令上述匪部加强酉、秀、黔、彭一线防务的同时，竭力推行“以地方为主，驻军为辅”的反动会剿方针，在各县普遍成立了驻军、地方官僚、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团务委员会”、“防共指挥所”等反动机构。酉阳县伪“团务委员会”以伪县长易元明为委员长，我的岳父王子履（酉阳县的党务头子）为付委员长，伪“防共指挥部”以田冠五旅的孟存仁团

长任指挥，易元明任付指挥，企图调动一切“公枪”、“私枪，对红军进行围剿，狂妄叫嚣要给红军造成一个所谓“步步荆棘，束手待毙”的局面。

酉、秀、黔、彭几县的“民团”原来就曾受过刘湘的“传令嘉奖”，武器弹药，都是刘湘的兵工厂以“价发”的方式提供的。酉阳县以派指名捐（即人头税）的办法，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由王子履到重庆找刘湘“价发”了四千多支步枪。其余三县的“团枪”均在三千支以上。而当时四县的封建势力，为了争权夺利，扩充实力，自清末以来，就大搞“枪杆竞赛”，私下购置了大量枪枝弹药。据酉阳伪团务委员会一九三三年暗中统计，全县各地封建势力的私有枪枝总数竟达一万二千多支，仅砂石乡土豪姜里斋一家，就有私枪三百多支。濯水区（原属酉阳，现属黔江）伪区长龚聘卿（大恶霸、外号“金罗汉”）几弟兄的私枪合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团。至于拥有一百支私枪的土豪，则全县各乡均有。

秀、黔、彭三县当时私枪的情况我不够了解。但从一九三九年伪二军李延年在四县“剿匪”时统计各县均有一万大几的私枪情况来看，红军时期，秀、黔、彭三县的私枪，每县大约有一万支左右。

由于反动派内部矛盾重重，个个都想“保本”。红军在边区开展革命活动达两年之久，国民党军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红军打倒那里，国民党军队就溃败到那里。群众比喻为“耗子见到猫，掉头就开跑”。

（摘自南界原始记录第33号，陈子尚笔述）

第二部分

《首战攻克黔江》查证、参考资料

红三军因为得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整体补充，领导决定到鄂川边先打开一个局面相机建立根据地。七师的一个团在红三军的先头去攻打四川的黔江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从距黔江还有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打起，边打边进，行程一百二十里打了三仗，到傍晚的时候打下黔江城。消灭了当地团防周化成部约一个团的兵力，使部队得到了一些枪弹和物资补充。但那时我们还不是大量补充俘虏兵的。只挑了百来人补到部队，其余都发给路费打发回乡了。我们还没有摆开做群众工作的摊子，四川敌人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向我们进攻来了。我们组织了一个鄂川边游击大队在那里活动（后来发展为鄂川边独立团），部队就撤离黔江。

（王绍南：《黔东的春天》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294页）

关于当时黔江守敌之兵力部署

黔江县民政局付局长舒鸣阶（曾任伪镇长）说：“红军到来之前，驻守黔江县城的是川军剿匪司令周化成的部队。周部当时有两千多条枪，下头分两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姓黄，驻中坝；二大队队长姓刘，驻大路坝；城里住的周化成的手枪营。

（根据黔江原始记录3号1页及舒鸣阶1975年9月7日补充材料整理）

黔江县南海公社老贫农汪俊林（大路二队，七十六岁）何付仁（大路四队，六十七岁）等反映：红军攻打黔江的头一天（冬月初五）驻守在大路坝的敌军得知红军已到活龙坪，要来攻打黔江，（他们）一面加紧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到钢厂（现南海公社桥梁大队）、新场口（现南海公社大路五队）等地搭哨棚，妄图阻截红军。

（黔江原始记录4号1页 杨焕章、龚节流1975年4月26日记录）

关于红军攻打黔江的时间及战斗经过

黔江县城北公社穿洞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孙振华说：“红军进城好多年，我就有好多岁。我就是红军进城那天（癸酉年冬月初六）生的。

黔江县联合镇张文仙（城市贫民，七十一岁）说：“红军是癸酉年冬月初六下午（太阳只有竹竿高）进城的。当时红军由中坝打来。一路从大堰口，一路从桃子坝打进城。第二天（冬月初七）大部队接着进城。在黔江县城住了一个星期，冬月十三晚上离开黔江城。我为什么记得清楚？因为：我父亲当时被国民党伪政府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已坐了三年。红军打进黔江城后，冬月初七日打开监门，放出被关的犯人。我父亲就是红军救出的。这个日

子是我终生难忘的”。

黔江县南海公社大路大队三生产队贫农汪和富（七十五岁）说：“红军是癸酉年冬月初六由砂龙嘴河出来的，在大路坝打垮周化成匪部。

（黔江原始记录2号1页，龚节流记录）

黔江县南海公社大路二队老贫农汪俊林（七十二岁），大路四队何付仁（六十一岁），大路五队刘力理（六十六岁），大路大队汪昌云（六十四岁）等反映：冬月初六早饭过后，红军从湖北咸丰县水坝直奔大路坝。敌军一触即溃。其中有一连匪兵龟缩在街上万寿宫里，妄图凭借庙子周围的高房子负隅顽抗。匪兵从庙里投出了许多手榴弹，把周围的房子都炸着了火。红军一面包围敌人，一面奋力灭火。下午，红军冲进庙子，全歼敌军。

敌军另外一个连从大路坝逃窜到曹家沟的鬼门关，妄图依靠险要地势与红军决战。我军于中午时分发起冲锋，打死敌军四、五十个，俘虏敌军一百三十八人。该连姓黄的一连长也当了俘虏。

大路坝战斗中，红军还缴获了大量银元和其它物资。

（黔江原始记录4号12页、杨焕章、龚节流1975年4月26日记录）

黔江县力水公社华兴二队邓吉富（曾参加红军攻打黔江城）说：红军打大路坝后分三路进攻黔江城：一路由板凳岩、火岩，翻八面山，下桃子坝，进黔江城；一路由大路坝经中坝、羊头山，进黔江城；一路由九盘岭、上马岩、高石，过老鹰关、大坟堡、杉木垭、下坝抄围南沟（这一路由于路远，赶到县城时，战斗已结束）。

（黔江原始记录5号1页 龚节流1975年5月2日记录）

黔江县民政局副局长舒鸣阶说：红军从大路坝打进城来，周化成的两个大队长都被打垮啦。最后只带了二百来个残匪和伪县长殷鉴一道，从青岗、半河沟逃到彭水去了。

（根据黔江原始记录3号1.2页及舒鸣阶1975年9月7日补充材料整理）

湖北咸丰县大路坝公社大路大队二生产队老社员汪和富说：“红军在大路坝攻打万寿宫时，牺牲了一个红军，埋在老场医院下面那个地方。受伤七八个红军，轻伤骑马，重伤用担架抬。我当时抬了一个伤员到中坝。”

中塘街上向永香说：“红军伤员是从大路坝抬下来的。冬月初六晚，就住在我家的柜房和堂屋，有七八人，当晚牺牲三个。一个是排长姓黄（坟还在），还有两个小战士。排长死后，红军以洋钱三十元在中塘街上×××家买的一棺材，安埋在杨家坡槽田老坎。

李道宣，李道奎、向保成等说：“当天红军打进黔江城，牺牲两个战士，是埋在大北门外的，现还有一所坟在。

（黔江原始记录9号1页 龚节流记录）

黔江县中塘公社黄九林（女，六十五岁）华章恒（六十三岁）说：“一九三三年（癸酉年）冬月初六，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前哨部队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打到黔江城。大部队当晚在

中坝住。贺龙同志住现中坝四队华大韦家，警卫员也在一起”。

黔江县联合镇居民张文仙说：“一九三三年冬月初七，贺龙及大部队开进黔江城。贺龙驻在天主堂，部队驻在城周围，东至下坝酒厂以上，南至酉阳山，北至桃子坝，西至南沟。红军共在黔江驻七天。于冬月十三日，离开县城。”

黔江县新建公社邓吉宣说：“贺龙先住在城里，后住桃子坝。”

(黔江县原始记录8号3页 龚节流记录)

红军在黔江县城的活动

黔江县力水公社华兴二队邓吉宣（曾参加红军攻打黔江县城）说：“红军打下黔江城后，第二天就分别派兵前往栅山、县坝、舟白渡、凉水井等地，追击逃散的敌人。我走的是凉水井那一路。”

(黔江原始记录5号5页 龚节流记录)

黔江县联合镇居民、糖果厂退休工人宋九成（七十二岁）说：红军进城后，满街都写有标语：“穷人不还富人钱”……。

黔江县联合镇居民张文仙说：“我当时是在黔江石印局写字。红军进城的第三天来石印局印布告，是我书写的布告，有两千多字。上面标题是《红三军入川告酉、秀、黔、彭父老昆仲姊妹书》。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题目。”

黔江县联合镇李道宣、张文仙、宋九林、李道奎等老年人反映：红军进城后，在水巷子出去的河坝里（卫家塘），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在街上住的人都去参加了。大家站在河坝听贺龙同志讲话。贺龙同志当时身上穿的是青色短衣服，脚上穿的水草鞋，是站在河堤上。一开始就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来开会的人都是八字不好的人。”当时还讲了一些别的话，现在记不得了。

(黔江县原始记录8号1页 龚节流记录)

黔江县中塘公社劳动一队贫农社员李明玉（七十二岁）说：“当红军路过中塘时，有几个人专门用石灰写标语。现在已找不到了。只记得有以下几条：“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不交租、不纳税！”“穷人不还富人钱！”“佃户不完地主课！”“保护来往行商！”“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打倒土豪劣绅！”记得当时还发得有传单，给我都发了一张，写的是“苏维埃政府……”，内容记不得，传单也失了。”

(黔江原始记录8号2页 龚节流1975年4月26日记录)

黔江县联合镇张文仙、朱远生、杨友良（女）、杨士节等人反映：“红军入城后，冬月初七，打开了伪政府的监狱，释放了无辜受害的群众。同时把大地主蓝讼棍、庞季凡，土豪杨国光（城里李独生的女婿）等大坏蛋抓了起来。并在街上抓了坏人陈老昌（当时红军正叫群众去背地主的谷子，陈老昌威胁群众说：“你们去背嘛，以后老爷们回来了，你们要背时的。”于是红军便把他抓了起来）。这三个被抓的人，都是押到活龙坪枪杀的。红军在黔江城里还打了宁斐然、吴前太、周二机匠、曾启凤、炎六贞、李独生、孙君挥、杨廷宣、尚志

光、韩顺之、李之生、黄康成等十二家大土豪，开了他们的谷仓，分了他们的财产。

冬月初九，红军派了一个班，从舟白渡过河，留两人守着渡船，其余八人在街上找了群众杨健带路到钟家坪抓地主杨松涛。但杨松涛早已跑了，只抓了他的女人。因为他女人刚生小孩不几天，红军把她押到半路就把她放了。红军只牵了他家骡子转回黔江城。

在黔江城附近城北，打了孙白琴、朱保清、殷明珍、尚子光，周远登等五个土豪，打开他们的谷仓，将谷子分给了群众。

(黔江原始记录7号1—3页，龚节流1975年5月7日记录)

黔江县南海公社大路二队贫农社员姜俊林说：“红军在思想田湾打了土豪李国林，当时他家有千多挑谷子。红军来时他已经跑了。红军把他家的仓库打开，把粮食分给了穷人。但因当时老百姓对红军不够了解，不敢收粮食。红军做了很多工作，老百姓才收下了粮食。

红军还在了湖北与大路坝交界的地方，打了土豪李正文。把他粮仓打开，把谷子分给老百姓。大路五队贫农刘万理也分得一筐谷子。

同时还镇压了湖北大地主秦自安，并把他的家产分给了农民。

(黔江原始记录7号4页，龚节流1975年4月29日记录)

黔江县中坝公社社员田明亮(七十六岁)向席成(七十六岁)说：红军冬月初六中午到的中坝。先头部队直打进黔江，后面的大部队在中坝住宿一晚。他们一到就问哪些是土豪。当时我们还不懂“土豪”这个名词。红军解释说：“就是那些有钱的人家。”当晚他们就打了街上土豪李佩林，打开谷仓，叫群众去背粮食。红军到后，其他土豪就跑了，没有被抓到。伪乡长刘伯斋也跑了，红军就牵去了他的骡子，并把他家用具坛坛罐罐等分给了群众。后来红军在这里抓走伪乡长伍保和的儿子伍国军(后放回)，杀了地主向民生家的一只肥猪。

老社员李明玉说：“红军在沙子坝杀了湖北抓来的两个地主。”

(黔江原始记录7号1页，龚节流1975年5月7日记录)

关于红军执行纪律情况及军民关系

湖北咸丰县大路坝人民公社四季红大队社员刘存周(七十六岁)说：红军在大路坝打仗时，敌人在万寿宫庙子里(现在粮点)顽抗，并向外摔了大量的手榴弹，引起街上的房子着火，烧掉一些房子。红军打进城后，贺龙派花顺涛(副官)来大路坝向老百姓“赔偿”损失。贺尤说：“房子着火是我们来打仗引起的，我们不来打仗，房子也就不会被烧。我们应该负责赔偿。”因此，凡是房子被烧了的，都由红军按原价或比原价更多的钱给予赔偿。群众都说：红军好！贺龙好！当时我的房子也被烧了，红军赔了我二十两鸦片烟。后来大家派我和汪绍齐当代表，由花顺涛带着我们去见贺龙、关向应。一进万寿宫庙子，花副官就说：“报告贺军长，损失都赔清了。”贺龙问我们：“都收到了吗？”我和汪绍齐说：“都收到了。谢谢军长！……。”

(黔江原始记录9号1页 龚明安、龚节流陈金友、王图碧、杨焕章1975年4月29日记录)